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历史变迁与演化趋势分析

韩占兵

(黄淮学院 经济管理系,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要:文章利用统计分析与归纳总结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了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历史变迁过程与未来演化趋势。结果表明:以改革开放为分界,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变动轨迹存在较大差异。在改革开放前的第一阶段,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处于萎缩状态,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流动性不足,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变化常常受制于政治、社会等非经济性因素的严重影响,产出结构的变化快于劳动力总体就业结构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变化呈现出高流动性和强规律性的特征,劳动力总体就业结构的变化快于产出结构的变化。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历史变迁;演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6)15-0106-04

0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的变迁,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适应不同阶段的农业生产需求,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1952—1991年,随着国内人口总量的上升,中国农业劳动力在绝对数量上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1991年达到最高水平的39098万人。1992—2013年,在全社会劳动力总量依然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开始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一直降低到2013年的24171万人。另外一方面,建国以来,中国非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持续上升,而且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并在20世纪初期超过了农业劳动力数量。就结构变化而言,建国以来,中国劳动力农业就业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而非农业就业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具体来看,1952年,农业就业比重最高,为83.54%,直至降低到2013年的31.40%。与之相对应,建国以来,中国农业GDP比重也呈现出持续下降的局面。另外,非农业就业比重则从1952年的16.46%提升到2013年的68.60%。上述数据反映出,建国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业人口持续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农业部门劳动力在逐渐减少,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在日益增加。

综上所述,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历史变迁可以具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第一阶段和改革开放后(1978—2013年)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变化受政治因素等非经济性活动影响较大,可遵循的规律较为欠缺。在第二阶段,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变化趋势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历史规

律,受城镇化和工业化等经济性因素影响较为明显。基于上述总体认识,本文将利用统计分析与归纳总结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历史变迁过程与未来演化趋势。

1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历史状况

1949年,新中国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小农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这一客观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依然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1952年中国工业净产值占工农业净产值的比重仅为25.3%,工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只有6%^[1]。基于快速恢复经济,巩固新生革命政权的需要,同时也受制于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选择了重工抑农的发展战略,全面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横亘城乡分野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此背景下,城市经济以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则以粮食生产为主,农民丧失了就业意愿选择权,被人为的限制在广袤的乡村土地上。在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7年这一阶段,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呈现出了超稳定状态,完全背离了Lewis的二元经济转换理论。由图1(下页)可见,在该阶段,中国农业就业比重除在1957—1963年变动剧烈外,其他时间均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据此,本文具体将细分为三个时间段来探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业劳动力历史状况。

1.1 1949—1957年:农业就业比重缓慢降低时期

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农民的就业选择权并没有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经过短暂恢复,中国开始了国民经济建设和“一五”计划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4YJC79004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CJJ089);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15A790019);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5-ZD-084);河南省社科联、省经团联调研课题(SK1-2015-2839)

作者简介:韩占兵(1982—),男,河南上蔡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金融与财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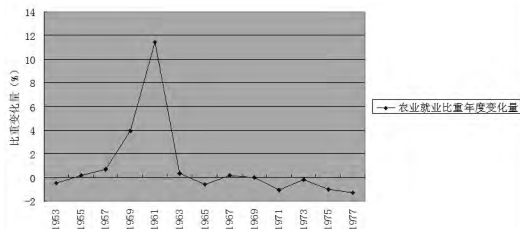


图1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业就业比重的年度变化量走势

举措吸引了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当中就业。据估计,在上世纪50年代,农村各种专业手工业者约200万人,而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的农民约1000万人^[2]。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农业就业比重趋于缓慢降低。1952年农业就业比重为83.54%,到1957年则减少至81.23%,年均降低0.39个百分点,而同期,非农业就业比重则由16.46%上升到18.77%。在该阶段,农民自由迁徙权也有较为充分的保障。据有关学者测算,1952年全国城市人口7000万人,1957年增加到99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2.5%上升到19.7%^[3]。农业劳动力的对外迁移,对于满足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建设所需的要素需求做出了突出贡献。

1.2 1958—1963年:农业就业比重急剧变化时期

这一阶段,在政治因素等非经济性力量主导之下,中国农业劳动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结构上,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急剧突变的异常现象。1958年,受极“左”路线影响,“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之后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在此背景下,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形成了史学界所谓的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该时期,大量农业劳动力被大炼钢铁和工业虚假膨胀性生产所占用,导致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非正常性急剧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由1957年的19309万人降低到1958年的15490万人,净减少3819万人。同期,农业就业比重由1957年的81.23%降低到1958年的58.23%。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减少直接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据统计,1957—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下降了24.4%。为了克服经济困难,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使得大量农业劳动力又重新回到粮食生产领域。经过艰苦努力,到1963年6月,同1961年1月比,全国职工总数减少了1887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4]。在此情况下,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市场商品供应状况缓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略有上升。1963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恢复性上升到21966万人,比1960年净增加4950万人。同时,农业就业比重也由1960年的65.75%升高到1963年的82.45%。中国农业劳动力在1958—1963年间如此大规模的涨落起伏、急剧突变,在世界农业人口变迁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这同时也说明中国特定时期非经济性力量的影响之深。

1.3 1964—1977年:农业就业比重相对稳定时期

这一时期,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深化,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选择权和自由迁徙权被严格限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固化,中国农业就业比重处于相对稳定阶段。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其中明确规定,“对于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从小城市迁往大城市,从其他城市迁往北京、上海两市的,要适当限制。”这一规定使得中国大批农业劳动力被置于户籍政策的严格管控之下,基本上丧失了自由迁移到城市中追求要素高收益率的权利。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生产生活秩序被全部打乱,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使得城市经济中大量就业问题无法解决。在此背景下,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出现了人口由城市向农村的反向流动。自1968年底到1977年,约有1600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同期还有数百万城市机关干部知识分子被下放农村劳动^[5]。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萎缩状态,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相对稳定。由图1可见,1964—1977年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平均维持在79.58%左右,且年均仅降低0.55%。

2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化和制度体系的优化调整,中国大批农业劳动力被长期禁锢在乡村土地上的政策壁垒被逐步放松和消除。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步伐,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渐进式的向一元经济结构进行转换。在“城镇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6]。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78—2013年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从70.53%下降到31.40%,共降低了39.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1.09%。而在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7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每年平均降低仅0.36%,前者明显远高于后者。从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看,受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尽管建国后,乃至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都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但是,中国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在1991年达到39098万人的历史高位后,开始逐步下降,呈现出日益萎缩的状态。这表明,改革开放35年来,随着城乡劳动要素收益率差距的扩大,大批农业劳动力迅速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Lewis的二元经济转换理论。由图2(下页)可见,改革开放后的1978—2013年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年度变化量大部分为负值,处于横轴以下。这说明中国农业就业比重在该阶段持续下降,而非农就业比重则连年上升。需要强调的是,在1997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见图1)历史性的第一次低于非农就业比重,此后经过1999年的反弹逆转,并在随后的2000—2002年的连续三年里达到相等。而后一直保持着低于非农就业比重这一趋势,这是一

个重大的国情变化。同时,进一步分析图2可得,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的变动趋势并非总是以下降的姿态一以贯之,在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逆势上升。综合而言,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的变化总体呈现规律性的短周期特征,据此,本部分将具体分为五个时期来讨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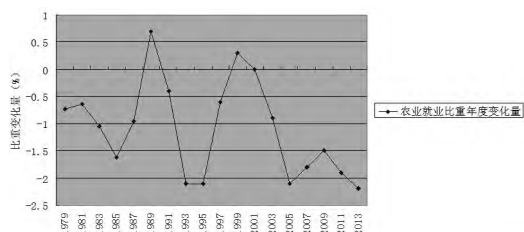


图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就业比重的年度变化量走势

2.1 1978—1987年:农业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速度逐步加快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改变了中国农村旧的经营管理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开创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黄金时代。对农业劳动力而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务农吸引力。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就业比重下降的速度比较缓慢。如图2所示,1982年农业就业比重为68.13%,仅比1978年的70.53%下降了2.4个百分点,年均降低0.6%。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展,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了多年未见的欣欣向荣局面,中国农业劳动力外流速度日益加快。一方面,在广大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大量涌现,将部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领域。另一方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成为改革主战场,工业企业效益改善和第三产业发展,为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就业岗位。在此背景下,以“民工潮”为标志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高潮在80年代中后期逐渐显现。据统计,仅1983—1988年期间,就有63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中,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超过24%^[6]。由图2可见,1983—1987年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下降速度逐步加快,由1983年的67.08%降低到1987年的59.99%,年均减低1.77%,下降速度明显提高。

2.2 1988—1990年:农业劳动力总量第一次异常增加

由于经济连年扩张和货币超发严重,从1988年开始,以物价飙升为特征的通货膨胀日趋恶化,物价指数一度达到34.8%的高位。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的蔓延,国家对经济实施了以“治理整顿”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其措施之严厉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之最。通过财税和信贷政策的收紧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被大幅压缩,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受之冲击,大量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被迫逆向回乡。在广大农村,乡镇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出现萎缩,吸纳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能力受阻。在此背景下,农村非农就业的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同时,为做好治理整顿,国家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流

动政策措施。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1988—1990年间,农业劳动力总量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现异常增加的现象。由图2可见,中国农业就业比重由1988年的59.35%上升到1990年的60.10%,年均提高0.25%,上升趋势明显。

2.3 1991—1997年:农业劳动力总量持续减少,规模扩大

从1991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了新一轮高速增长的新周期。特别是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沿海地区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显著提速。这一时期,随着城乡劳动收益差距的加大,“孔雀东南飞”现象开始出现,大批农业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的转移和淘金行为促使了“民工潮”的形成。在此背景下,1991—1997年间,中国农业劳动力总量持续减少,规模迅速扩大。据有关学者测算,1994年,从乡村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为7000万,1995年达到7500万^[7]。由图2可见,中国农业就业比重由1991年的59.70%下降到1997年的49.90%,年均降低1.40%,下降趋势明显。该阶段的农业劳动力总量减少态势在1993—1995年间达到高峰,农业就业比重在这三年中年均降低2.1%,实属罕见。

2.4 1998—2002年:农业劳动力总量第二次异常增加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进出口贸易量出现大幅萎缩,利用外资量快速下滑。受此影响,国民经济日趋衰退,以供给过剩和物价指数下跌为主要表现的通货紧缩现象逐渐显现。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步伐加快,大量下岗人员开始在国有企业中普遍出现。这一时期,农产品实现了丰年有余,但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所有上述情况都直接或间接地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1998—2002年间,农业劳动力总量在改革开放后第二次出现异常增加的现象。由图2可见,中国农业就业比重由1998年的49.80%上升到1999年的50.10%,提高了0.3个百分点,并且在此后三年中一直徘徊于50%的水平上。

2.5 2003—2013年:农业劳动力总量步入加快减少轨道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新周期,国家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提高到了“重中之重”的地位。从2004—2013年,中国政府连续十年下发了十个关于“三农”工作的中央1号文件。在“支农”的指引下,我国先后出台实施了以“四减免”(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四补贴”(种粮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为主要内容的支农政策体系。“三农”政策也从最初的“支农”扩展到“支农惠农”、“强农惠农”,2013年又进一步拓展到“强农惠农富农”。中国农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黄金期^[8]。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4—2013年,中国粮食实现10年连续增长,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4万吨,首次突破60000万吨大关。但是在农业收益率较低的现实情况下,“十连增”的显著成绩并没有改变农业劳动力萎缩减少的趋势。这一时期,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总量步入加快减少轨道。由图2可见,中国农业就业比重由2003

年的49.10%下降到2013年的31.40%，年均降低1.61%，下降速度明显加快。中国农业劳动力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3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演化趋势

综合上文分析,总体而言,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阶段,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变动轨迹存在较大差异。此处将作进一步对比讨论,以科学判断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演化趋势。

根据表1可见,在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第一阶段,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处于萎缩状态,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流动性不足,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变化常常受制于政治、社会等非经济性因素的严重影响。同时,产出结构的变化快于劳动力总体就业结构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后(1978—2013年)的第二阶段,由于市场化转轨改革的深化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拓展,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变化呈现出高流动性和强规律性的特征。当然,劳动力总体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快于产出结构的变化。

上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异也表明了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演化趋势和历史走向。客观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快速萎缩是市场机制配置要素资源的直接体现,是中国由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城乡收入差距背景下经济理性人按照劳动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自由就业决策的结果,完全符合Lewis的二元经济转换理论所揭示的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历史经验。

表1 中国农业劳动力演化轨迹对比表 (单位:%)

时间		年均农业就业 比重变化	就业结构 变化	农业GDP 比重变化
第一 阶段 (1949—1977)	第一时期 (1949—1957)	0.39	2.31	11.90
	第二时期 (1958—1963)	-4.04	-24.22	-6.30
	第三时期 (1964—1977)	0.55	7.70	8.40
第二 阶段 (1978—2013)	第一时期 (1978—1987)	1.05	10.54	1.30
	第二时期 (1988—1990)	-0.25	-0.75	-1.40
	第三时期 (1991—1997)	1.40	9.80	5.40
	第四时期 (1998—2002)	-0.04	-0.20	3.30
	第五时期 (2003—2013)	1.56	15.50	4.3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测算。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

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直接造成高素质农村新生代劳动力不断流失。在“城镇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大量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被裹挟到人口迁徙的历史洪流中。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为17392万人,“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61%。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导致农业劳动力加剧弱化的趋势日益突出。“广袤乡村难寻年轻人”已经成为现阶段农村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正由过剩走向短缺。在此因素叠加下,城乡劳动力收益的差距将会更加扩大。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青壮年农业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趋势将会难以遏制,那么,与现代农业生产要求相匹配的农业从业者将呈现出日益严重的结构性短缺^[9]。随着大量上一代农民的相继老去,农业劳动力的代际断层将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战略问题^[10]。面对如此严峻局面,许多专家学者多次呼吁,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农业劳动力断层和后继无人问题,中国将面临无人愿意种地的尴尬境地,长此以往,必将对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严峻挑战。

综上所述,在可预期的未来,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将持续萎缩下去,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问题将伴随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全过程。在该层面上,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也为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提供了历史契机。因此,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变化将处于一个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生、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复杂调整期。

参考文献:

- [1]韩俊.中国城乡关系演变60年:回顾与展望[J].改革,2009,(11).
- [2]韩俊.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特点[J].江淮论坛,1995,(2).
- [3]邹农俭.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 [4]陈建兰.1961—1963年中国城镇人口精简浅析[J].兰州学刊,2006,(6).
- [5]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006,(4).
- [6]卢迈,赵树凯,白南生.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回顾与展望[D].国研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1.
- [7]赵俊超,孙慧峰,朱喜.农民问题新探[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 [8]朱满德,程国强.中国农业政策:支持水平、补贴效应与结构特征[J].2011,(7).
- [9]陈锡文,陈昱阳,张建军.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产出影响的量化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2).
- [10]韩占兵.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分析框架、现实判断与破解之道[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责任编辑/浩天)